

# 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实践与理论辨析

——《红牌：美国如何成为世界最大体育丑闻的吹哨人》述评

任振朋,王润斌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近年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严重,引起各方重视。美国与瑞士采取联合行动抓捕多名国际足联官员,将国家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议题推向高潮。肯·本辛格所著《红牌:美国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体育丑闻的吹哨人》一书详细披露了美国调查国际足联腐败案件的实践过程,并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对该书的述评,着重探究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案的背景、贡献与走向。美国依据法律从最初的调查过程到委托瑞士警方抓捕、引渡至美国并最终起诉,完成了司法介入国际足联的全过程。其中,腐败行为适用于美国司法属人和事项管辖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行为符合《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的相关法条精神,引渡行为符合《相互法律援助条约》和《美国瑞士引渡条约》。治理国际体育组织腐败问题,强化外在法治监管和推进组织善治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国际足联;腐败;司法管辖权;美国

中图分类号:G 843;G 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23)02-0001-06

## Practice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 on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 Corruption of FIFA——A Review of *Red Card*:

## *How the U. S. Blew the Whistle on the World's Biggest Sports Scandal*

REN Zhen-peng, WANG Run-b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in FIF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ttracting attention from all sides. The US and Swiss have launched a joint operation to arrest several FIFA officials, bringing to a head the issue of national judicial involvement in FIFA's corruption. Ken Bensinger's book titled *Red Card: How the U. S. Blew the Whistle on the World's Biggest Sports Scandal* written by thoroughly reveals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investigating the corruption case of FIF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kes in-dep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s a review of the book "red card",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contribution and direction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FIFA corruption case, with a review of the book "red card" as the main conten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US completed the whole proces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FIFA from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process to the commission of Swiss police to arrest, extradit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ally prosecute. The occurrence of corruption is applicable to the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Subject-matter of the US judiciary. The alleged conduct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against extortion and bribery. The act of extradition complies with the treaty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the 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itzerlan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deal with the corruption of FIF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 the external legal supervis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good governance of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FIFA; corruption; jurisdiction; United States

收稿日期:2022-01-17

作者简介:任振朋(1988—),男,河南濮阳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体育组织与治理。

王润斌(1981—),男,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历史与文化、奥林匹克运动。(通信作者)

2015 年 5 月,美国联合瑞士警方逮捕了数名国际足联官员,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虽然以国际足联为代表的国际体育组织腐败问题丛生,但源于国际足联非政府组织的属性,美国主导的本次域外执法引发了学者有关行动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争论<sup>[1]</sup>。《红牌:美国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体育丑闻的吹哨人》(Red Card:How the U. S. Blew the Whistle on the World's Biggest Sports Scandal,以下简称《红牌》)一书详细披露了美国成立的调查小组对国际足联腐败案的调查取证、抓捕、引渡、诉讼等整个过程。本研究以此为基础,详细剖析案件调查的法律依据和相关人员的逮捕、引渡、诉讼过程,对美国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案进行评述。

## 1 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产生与危害

世界知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认为,在涉及金钱、竞争和权力的背景下,腐败是一个持续的威胁<sup>[2]</sup>。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足联通过娴熟的商业化运作,打造了足球世界杯这一商业帝国,获得并累积了雄厚的财力。而国际足联官员在组织拥有高度自治权和缺乏外在监管的背景下,经受不住源源不断的金钱诱惑,围绕领导选举、世界杯赛事申办屡屡发生权钱交易、选票之争等腐败行为。国际体育组织腐败事件接连爆发主要源于组织内部高度集权和外界监管缺失两方面原因。

其一,国际足联组织内部坚守的传统体育自治方式,异化为以主席为核心的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的治理方式,这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国际足联连同国际奥委会在国际体育领域的地位愈发重要,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体育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国际足联在直接处理国际足球事务或通过体育间接参与国际事务时,其角色也由传教士、外交官逐渐转变为商人、企业家。<sup>[3]</sup>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国际足联在管理和治理世界足球方面更易受到个人或权威机构的影响。如为了扩大主席的权力和义务,加强主席专制,国际足联章程不断被修改。阿维兰热在担任主席期间形成了这种专制、不负责甚至腐败的文化风气,下一位继任者布拉特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任之后便试图削弱并架空秘书长权力,从而掌管国际足联的大小事务。<sup>[4]</sup>相应,国际足联曾经赖以自豪的组织自治体系,也逐渐异化为以主席为核心、执委为主体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独裁”管理体系。组织内部高度集权的国际足联和

手握重权的小部分利益集团,在组织运行不透明和决策程序不规范的便利条件下,利用规则漏洞进行利益往来,以公徇私滋生腐败,严重损害国际足联的组织信誉和公信力。

其二,国际足联外部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的发生。一直以来在国际法范畴内,难以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法律规制,依照国际惯例主要是靠其注册国法律及行为地(国)法律进行管制<sup>[5]</sup>。瑞士是国际足联总部所在国,但其特殊的国情和法律制度,非但没有及时有效发挥国际足联的外在监管主体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足联的腐败。首先,瑞士拥有相对宽松且适合非政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法律环境,如依据瑞士联邦法律被定义为协会的组织不必公开财务,享受国内反腐败法的豁免,并被赋予管理自身事务的重大自由。<sup>[6]</sup>其次,瑞士特有的保密制度使得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可以逃避政府的监管。<sup>[7]</sup>再者,瑞士民间非常注重非政府组织发展。据统计,目前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体育组织有 60 多家,每年为瑞士经济贡献超过 10 亿美元<sup>[8]</sup>;其中国际足联收入远超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瑞士当局难免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放任甚至包庇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另外,国际足联凭借掌管以世界杯为主的国际足球核心赛事,采用“不干涉原则”在保障组织自治前提下强势打压试图与之对抗的其他国家,排斥外界的干预与监管。

金钱和权力是腐败的重要诱因。国际足联凭借其国际足坛的垄断地位及对世界足球核心资源的掌控,坐拥雄厚资产,且具有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设置,瑞士宽松的非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国际足联发生腐败也不足为奇。面对腐败危机国际足联一再重申善治改革的坚定信念,但在实践中却有意回避组织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重大漏洞,希望通过所谓完善民主的形式化治理改革,挽救组织治理结构的危机。<sup>[9]</sup>一直以来,如国际足联这样大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决策透明度,常常与其所推崇的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相去甚远。<sup>[4]</sup>国际足联部分官员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滋生严重的腐败问题,充分暴露出国际足联在掌管国际足球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与组织初心使命渐行渐远,严重冲击国际足联自治体系以及威胁组织在国际社会和体育领域的信誉与公信力,也迫使组织面临重大生存和发展危机。

## 2 美国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案的过程

鉴于足球运动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国际足联的非政府组织属性,《红牌》一书认为调查国际足联的腐败问题极具敏感性,稍有不慎便会被质疑是美国“有计划的阴谋”或因落选2018年世界杯举办权而报复国际足联。<sup>[10]17</sup>《红牌》详细披露了国际足联腐败案的调查过程。首先,调查小组通过美林银行查询,获取到查克·布莱泽(1990—2011年担任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秘书长,1996—2013年担任国际足联执委)多次向海外银行和空壳公司转账进行洗钱、逃税的罪证,<sup>[10]88</sup>并通过联邦储备通信系统(Federal Reserve Communication System)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 Bank Payment System)查询、收集国际足联官员通过美国金融系统收受贿赂的转账记录。<sup>[10]80</sup>同时,依据国际法律援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委托瑞士警方对被指控的国际足联官员实施抓捕和引渡。此外,调查小组还通过诉讼程序寻求与被指控的国际足联官员合作,进一步实施调查、抓捕工作。

其次,在调查过程中为防止泄密引发国际足联的反侦察行动及转移罪证,调查小组针对所有相关工作

实施保密,尤其是针对核心人物布莱泽和何塞·哈维拉(巴西体育赛事传媒公司 Grupo Traffic 老板,国际足联腐败案的核心人物)实施机密的证人保护计划。与此同时,调查小组查询布莱泽的纳税申报记录,显示他至少有17年没有缴税。依据美国法律不主动提交纳税申报单是一种重罪,布莱泽仅因税务犯罪被起诉就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相应地,布莱泽再三思索后最终选择与调查小组合作,作为污点证人,谋求减刑的机会,这极大推动了整个调查进程。

再次,美国《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RICO)是打击商业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法律,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创立了包括电子监控(Electronic Surveillance)、卧底行动(Undercover Operations)、豁免权(Immunity)和证人保护计划(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在内的诉讼制度。<sup>[11]</sup>《红牌》指出,据布莱泽交代,国际足联官员通过与转播公司签署转播合同收取佣金获取高额收入,而巴西体育赛事传媒公司 Grupo Traffic 老板哈维拉则是国际足球整个腐败网络行贿、受贿的核心中介人物,调查小组采取“卧底行动”辅助电子监控设备获取其与足联官员长达数百小时的谈话录音,并依据 RICO 指控部分国际体育公司高管和国际足联官员涉嫌组织共谋电信诈骗、洗钱<sup>[10]186</sup>(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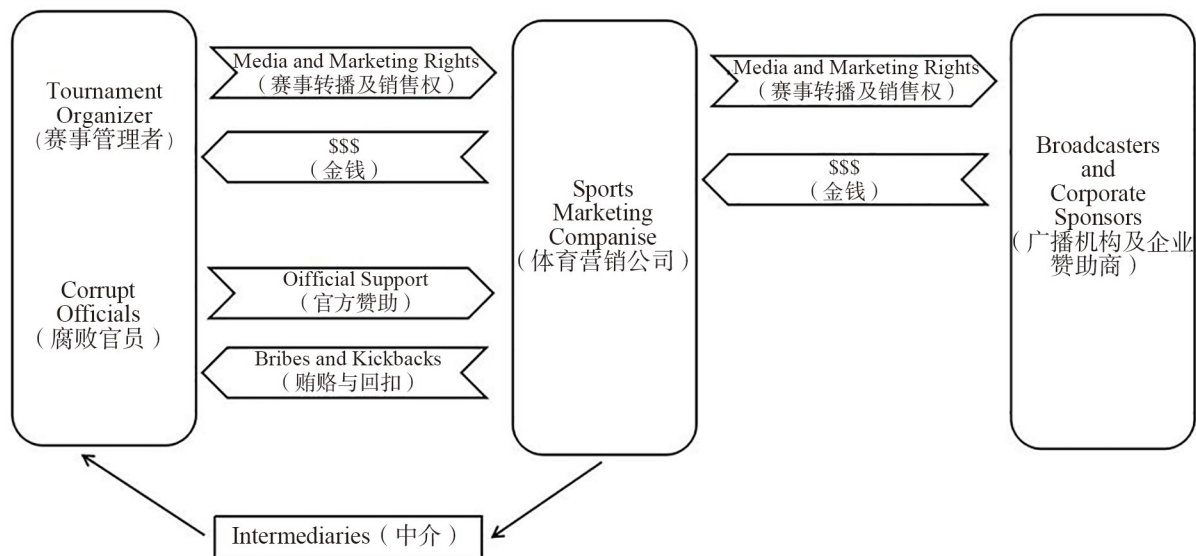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足联体育赛事营销贿赂关系图<sup>[12]</sup>



### 3 美国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理论辨析

#### 3.1 法律依据:《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

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官员指控的 47 种罪行中,最主要的是部分官员违反国际足联道德准则接受贿赂和回扣,构成诚信服务诈骗罪(Honest Services Fraud);使用电子邮件、电话、银行转账等方式进行谈判和收受贿赂被控电信诈骗;通过空壳公司、海外银行账户和伪造合同来隐藏受贿所得非法收入被控洗钱罪;官员之间互相密谋腐败和扭曲、欺骗(国际足联)组织被指控为 RICO 共谋罪。<sup>[10]</sup><sup>197</sup>

首先,RICO 适用于国际足联。RICO 是 1970 年美国通过的一项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联邦法律,起初被用来起诉黑手党等犯罪组织,后来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展到公司和企业。依据 RICO,企业主要包括“任何个人、合伙人、公司、协会或者其他合法的实体,以及各种不合法,但的确是由个人组成的事实上的组织和群体”,换言之企业既可以是公司企业或者工会团体、协会等合法组织,也可以是为了共同犯罪而纠结集合在一起的一伙犯罪人。<sup>[13]</sup>国际足联作为依据瑞士法律成立的足球协会,符合 RICO 中有关“企业”的规定,可依据 RICO 调查国际足联官员。RICO 作为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有力武器,其效力涉及域外犯罪行为,即域外犯罪行为如果威胁到美国的主权,或者是使相当数量的美国公民受到影响,本法律依然适用。<sup>[14]</sup>国际足联官员多借助美国银行收受贿赂并存在漏税、洗钱等腐败行为,这显然影响到美国公民的利益。

其次,RICO 针对组织犯罪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一个组织或公司只要属于某一有组织犯罪团伙,或是一个合法公司被卷入敲诈勒索的犯罪中,尽管没有亲自实施但同样构成犯罪行为。<sup>[15]</sup>RICO 为打击和防止犯罪组织渗透到合法企业中,通常情况下只要满足两项最基本条件即可适用:第一,被告是犯罪组织或企业的一部分;第二,被告有两项犯罪行为,包括贿赂、电信欺诈和洗钱。如果符合上述条件,被告就犯有敲诈勒索罪,并会受到严厉的判决以及没收资产。<sup>[16]</sup>美国司法部对外宣称,针对国际足联官员指控的核心证据为“国际足联官员借助美国银行转账、洗钱获取贿赂发生腐败”,同时被指控的 14 名足球官员中有 2 名美国公民、1 名美国永久居民、3 名在美国

拥有住宅,以及大多数官员参与管理总部位于迈阿密的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的事务。<sup>[17]</sup>总之,无论是调查还是起诉,RICO 均适用于国际足联官员的腐败问题。

#### 3.2 抓捕:《相互法律援助条约》

为了保障抓捕工作的保密性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外界干扰,瑞士警方要求美国司法部门不要介入。2015 年 5 月 27 日,针对国际足联腐败官员的抓捕行动开始实施。包括弗里·韦伯(2012—2015 年期间任国际足联副主席和执委)在内的 7 名国际足联官员被抓捕。依照国际惯例,美国并不能实施域外执法,不能直接进入瑞士本土执行抓捕行动,只有瑞士司法部门和警方具有直接管辖和逮捕国际足联官员的合法权力。所以,针对国际足联抓捕工作则是美国司法部依据本国法律援引委托瑞士警方完成的。瑞士警方配合美国的行动所依据的是美瑞之间的《相互法律援助条约》(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 MLAT)。

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逐渐增多,以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为代表的跨国犯罪活动也日渐增多,相应地,在国际刑事领域各主权国家之间合作也愈加频繁。其中,主权国家在打击跨国犯罪,针对某一罪犯提起诉讼时,往往需要其他国家提供交流情报、委托调查、提供证据、代送传票等相关法律援助,且这种法律援助通常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签署的《相互法律援助条约》,并通过各自的警察机构进行非正式合作,目前美国已与瑞士在内的 47 个国家(地区)签署了《相互法律援助条约》。<sup>[18]</sup>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为有效打击国际犯罪以及摆脱瑞士相关银行保密制度的限制,方便收集跨国犯罪(银行转账记录)证据,与瑞士进行多次谈判,并于 1977 年两国正式签署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以促进两国在国际刑事领域的法律合作。<sup>[19]</sup>美国主导的这次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抓捕工作正是美国司法部依据《相互法律援助条约》向瑞士当局提交请求,并委托瑞士警方实施的抓捕行动。

#### 3.3 引渡:《美国瑞士引渡条约》

FBI 调查小组依据《相互法律援助条约》向瑞士警方提出抓捕请求,相应地,瑞士警方则可以将国际足联腐败案的相关人员关进监狱,但调查小组更希望他们被引渡至美国,并通过寻求合作继续深究国际足联的腐败事实。当瑞士警方在苏黎世展开抓捕行动的同时,美国司法部在布鲁克林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

国际足联官员的起诉书内容。其中,当天被捕的7名国际足联官员中韦伯和尤金尼奥·菲格雷多(国际足联副主席、南美足联主席)在不久后便被引渡至美国。在此次引渡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瑞士引渡条约》。引渡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协助制度,意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sup>[20]</sup>首先,引渡作为将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回国的一般方法,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为双向性,即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进行,且引渡的前提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已签署有关引渡的双边条约。美国和瑞士在1990年签署了引渡条约并于1997年生效,可以对部分国际足联官员进行引渡。其次,引渡发生的重要前提是“双重犯罪原则”,即请求引渡国家指控的犯罪行为同样在接受引渡请求的国家也属于犯罪行为。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官员的指控主要包括电信诈骗、洗钱、贿赂、逃税、妨碍司法公正等罪行,虽然两国之间针对同样的罪行在法律术语上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这些罪行在瑞士也属于犯罪行为。<sup>[21]</sup>再者,具备“请求权”的主权国家才有权提出引渡请求,换言之,请求国申请的引渡人员必须满足所属国、罪犯所属国或者被害人所属国的引渡条件。<sup>[22]</sup>上文已表述美国请求引渡的部分国际足联官员为美国公民或在美国居住,同时相关人员被指控的洗钱、贿赂等罪行多通过美国的金融和通信系统实施,因而美国满足“请求权”的条件。

### 3.4 诉讼:美国司法管辖权

案件的下一步进展是被捕的足球官员由谁(国家)提起诉讼,而这取决于司法管辖权。首先,国际足联属于非政府组织且腐败问题具有跨国性,而国际法院只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刑事案件,对此案并不具有直接管辖权。其次,国际足联作为依据瑞士法律所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理论上瑞士对于被捕的足球官员有直接的管辖权,但是瑞士对非政府组织特有的宽松法律制度,使其并不具备审判国际足联官员的能力<sup>[21]</sup>。综合前文所述,《红牌》一书认为相对于瑞士,美国有权保留对该案件的管辖权。

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管辖权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只有确立了管辖权,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启动,其裁决也才有可能得到承认与执行。其中国际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管辖权主要包括属人管辖权和事项管辖权。<sup>[23]</sup>属人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要求当事人必须与受诉法院具有最低限度联系。<sup>[24]</sup>美国州与州

之间的法院以及州法院与联邦法院之间都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是首要明确哪个法院具有案件当事人的管辖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联邦法院在涉外民事案件属人管辖权方面一直奉行长臂管辖原则。<sup>[25]</sup>长臂管辖原则(Long Arm Jurisdiction)主要指美国各州对人进行司法管辖的立法法规,其特点在于涉及有关达到特定目的诉讼中,通过代为送达法律令状对进入本州的非本州居民、公司以及直接或间接与本州人士有关联者进行司法管辖。依据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令》在涉外案件上并不要求案件与美国存在联系,允许与美国无关的外国人就发生在美国境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起诉讼。<sup>[23]</sup>美国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阐述了美国对此案拥有属人管辖权的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在美国策划犯罪,利用美国的银行进行犯罪,并瞄准了不断繁荣的美国足球市场。<sup>[26]</sup>此外,调查小组通过布莱泽获取到杰弗里·韦伯利用职务权力向体育营销主管提供美洲足球比赛的媒体、营销和赞助权以索取贿赂。美国司法部在起诉书中指出2016年在美国举办的美洲杯比赛就存在高达1.1亿美元的贿赂,而美国电视网络为这些转播权支付了数十亿美元,因此美国是被告犯罪行为的目标。按照《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的解释,效果原则是指国家对虽然在外国发生,但已经在本国领土内产生实质性效果,或者旨在本国领土内产生实质性效果的行为有权行使管辖权。<sup>[27]</sup>依据效果原则,美国对被指控人员应具有属人管辖权。<sup>[21]</sup>

事项管辖权(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指的是法院审理和裁决某一类案件的权限范围。依据《美国法典》(第28卷1331、1332条),美国法院获得事项管辖权主要有两种方式:“产生于美国宪法、法律或条约的诉讼案件,或者当事人双方必须属于不同的州,或者一方来自一个州,另一方来自外国。”如果美国是该行动的一方,那么美国法院将拥有事项管辖权。国际足联涉案人员被指控的47项罪行都是在美国境内或利用美国银行而发生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活动。与此同时,依据《美国法典》第28卷1332节第1款第2项规定,对于美国某州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争议金额在7.5万元以上的纠纷,由联邦地区法院管辖。显然,被指控的部分犯罪活动发生在纽约,如美国公民布莱泽、亚伦·戴维森(Grupe Traffic美国分公司的总裁)与被指控的外国(例如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公民之间借足球赛事转播权收受贿赂,数额达数百万美元。该案件符合美国针对涉外诉讼

案件的事项管辖权的相关规定。综上,《红牌》一书认为美国司法部针对国际足联官员指控的核心举证是部分官员收受贿赂的腐败行为多借助美国银行实现,<sup>[10]197</sup>因此无论是属人管辖权还是事项管辖权,美国对国际足联腐败案都具有司法管辖权。

#### 4 结论与启示: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治理路径

美国司法介入国际足联一直饱受司法越权质疑,且从未停断。同样,伴随国际足联被指控的腐败事实公之于世。这从学理上为国家司法介入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腐败问题提供了讨论空间。FBI 调查小组充分利用美国严厉的纳税制度,以布莱泽为突破口,以哈维拉为核心证人,依据《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相互法律援助条约》和《美国瑞士引渡条约》等法律文件与国际司法条约,完成调查取证、委托瑞士警方实施抓捕、引渡至美国和提起诉讼。国际体育组织腐败传闻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近年来尽管国际奥委会领导下的国际体育组织一再重申实施善治改革,但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腐败与治理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相对于美国司法介入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要关注如何在保障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前提下构建行之有效的外部监管机制。一方面,强化以国际足联为代表的国际体育组织的外在法治监督。联合国《反兴奋剂国际公约》以及欧盟《操纵体育比赛公约》为开展国际反兴奋剂工作和区域打击操纵比赛提供了法律框架,也为国际社会强化国际体育组织的外在法治监管提供了先进经验。国际社会要坚持多元共治的法治理念,依托国际合作构建统一的法律公约,通过信息共享开展跨国行动,在严厉打击国际体育组织腐败的同时,构筑全方位的司法监督体系,以威慑及预防腐败发生。另一方面,国际体育组织要进一步推进善治改革,完善自治体系。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看,国际体育组织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组织高度垄断、信息不透明、契约不完全、权力高度集中、决策程序不规范以及外界监督乏力等。<sup>[28]</sup>对于国际体育组织而言,要顺应国际体育善治潮流,以法治理念为统摄,通过提升组织透明度、强化问责制、规范民主程序、优化权力制衡等多方面举措,推进组织善治改革,提升组织治理能力,根治腐败恶疾,保障组织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姜世波,姜熙,赵毅,等.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的困境与出路: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深层思考[J]. 体育与科学, 2015,36(4):19-26.
- [2]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and Sport: Building integrity and preventing abuses [EB/OL]. (2020-04-10) [2021-05-10].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working\\_paper\\_no](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working_paper_no).
- [3] TOMLINSON A. The supreme leader sails on: leadership, ethics and governance in FIFA [J]. Sport in Society, 2014, 17(9):1155-1169.
- [4] 王润斌,姜勇. 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与治理之道:评安德鲁·詹宁斯的《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J]. 体育学刊, 2012, 19(1):61-65.
- [5] 刘海江.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约束方式:评述与思考[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107-113.
- [6] BACHMANN H. Lax Swiss laws led to less scrutiny of FIFA [EB/OL]. (2015-05-28) [2021-05-10].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sports/soccer/2015/05/27/switzerland-fifa-corruption-investigation/28021111/>.
- [7] 梁发带. 避税天堂里的国际足联[J]. 中国经济报告, 2015(7):112-114.
- [8] BRUCE W, BEAN. The perfect crime: FIFA and the absence of accountability in Switzerland [J].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7, 32(1):68-133.
- [9] 黄璐. 国际足联改革路线图研究:批判性反思[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6, 42(4):7-14.
- [10] BENSINGER K. Red Card: How the U. S. blew the whistle on the world's biggest sports scandal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2018.
- [11] 罗明海. 美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历史、类型及启示[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3(4):49-56.
- [12]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ports marketing bribery schemes [EB/OL]. (2020-04-15) [2021-05-10]. <http://www.justice.gov/opa/file/450251/download>.
- [13] 姚歌. 中美有组织犯罪刑事立法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有组织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D]. 开封:河南大学, 2012:40-41.
- [14] 李张健仪,陈晓济. 有组织犯罪调查与起诉:美国的经验[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09(4):29-35.
- [15] 周长军,于改之. 实体与程序:“打黑”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课题[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1:35.
- [16] DICENSO M B. A Long-Awaited Reboot: the FIFA scandal and its repercussions for Football's governing body [J].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017, 43(3):115-139.

(下转第 46 页)



面,这些项目可以根据女性特点进行改良,如将场地调整为室内与室外相结合或延长活动时长、任务早晚交替等来营造环境氛围,激发女性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2)引入现代健身元素。在传统的红色体育项目中引入现代健身元素,如在登山赛中加入手球对战或在侦查救援中增加攀岩环节等,满足女性的健身需求,促进女性的身体素质提升,增强女性的运动意识和自我调节能力。

## 5 结论

革命时期闽西苏区体育文化实践,无论是对当代的国防素质教育、学校文化灌输、青年意志培养或是妇女路线的开辟,都具有重要的探析价值。时代的需求与政策的支持,在宏观层面为研究闽西苏区体育的学者们提供了强大动力;在微观层面,我们应当推动广大研究学者深入闽西地方镇、村、街道,获取村民口耳相传的资料典故,深入挖掘早期体育实践活动,充分展现闽西苏区红色体育文化实践的力量与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黄文宾. 红色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7, 32(5): 38-40.
- [2] 福建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闽西苏区体育[M]. 漳州: 华安印刷厂, 1986.
- [3] 曾飙. 苏区体育资料选编(1929—1934)[M]. 合肥: 安徽体育史志编辑室, 1985.
- [4] 刘德佩. 论军事体育的概念及其特征[J]. 军事体育学报, 2013, 32(3): 35-38.
- [5] 中国近代鼓吹尚武的雄文——《军国民篇》[EB/OL]. (2018-08-18) [2022-03-20]. [https://www.sohu.com/a/248633805\\_620255](https://www.sohu.com/a/248633805_620255).
- [6] 邵天逸. “立德树人”背景下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J]. 体育学刊, 2017, 24(4): 63-67.
- [7] 蒋永萍. “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2(1): 1-6.
- [8] 熊欢. 新中国妇女体育 70 年发展的社会动力与历史经验[J]. 体育科学, 2020, 40(7): 31-39.

[责任编辑 江国平]

### (上接第 6 页)

- [17] WALID K. The FIFA rule of non-interference: how it contributes to corruption and how it contravenes kenyan law [D]. Nairobi (Kenya): Strathmore University, 2017: 34-35.
- [18]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 [EB/OL]. [2021-05-1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tual\\_legal\\_assistance\\_treaty](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tual_legal_assistance_treaty).
- [19] 郑勇. 美国、瑞士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与内容[J]. 比较法研究, 1988(4): 61-63.
- [20] 王铁崖. 国际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5: 134.
- [21] LEARY M. Where should they go: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ose being charged in the FIFA corruption scandal[J].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017, 40(1): 51-79.
- [22] 宋璇. 关于我国引渡制度的法律研究[J]. 法制博览, 2018(32): 227.
- [23] 李庆明. 论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中的管辖权[J]. 美国研究, 2012, 26(1): 47-67.
- [24] 杜涛. 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J]. 国际法研究, 2014(2): 82-95.
- [25] 谢望原. 域外刑事管辖权及其实现[J]. 法学论坛, 2000(1): 65-69.
- [26] AHMED. Why is the U. S. bringing down the hammer on FIFA? [EB/OL]. (2015-05-28) [2021-05-10]. <http://edition.cnn.com/2015/05/27/us/fifa-corruption-investigation-why/>.
- [27] 马呈元. 国际刑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204.
- [28] 任振朋, 李利利, 刘涛, 等.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国际足联腐败探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4(3): 264-269.

[责任编辑 江国平]